

七十年前，在懿园看地毯戏

王敬之

我母亲与张元和大姨是闺蜜，同喜好昆曲，常来往。两家都聘请张传芳定期上门拍曲，所以我从小听惯了悠扬的曲声，但也只限于不反感而已，并不喜欢。稍长后爱看京戏，也仅着迷于麒麟童、盖叫天、小翠花、艾世菊之类的做工戏。昆曲的唱，一句都不懂，从何喜欢起？有一次，长辈在拍曲《思凡》，好意指点我看曲本，我确很专心从头至尾一口气看到了底，看完全文，找来找去找不到唱到哪里了，旁人用手示意唱到某一个字，我倒抽一口冷气，天啊，唱了半天还是“年方二八”！从此再不想学了，长辈们也都放弃了引导我学唱的希望。

非常偶然，具体日期现在想不起了，肯定是抗战胜利之后、解放战争之前这段简短日子里的某一天，忽然听说大姨和她丈夫顾伯伯星期日将在他们府上合演一出地毯戏。既非公演亦非义演，纯粹私家活动，但此日大门敞开，来不迎，去不送，欢迎亲朋好友相互口传，来者不拒。自以为已经是个戏迷了，不花钱买票的白戏哪有不不看之理！但只知道有梆子戏、蹦蹦戏，不明白“地毯戏”是什么玩意儿。他们家在建国西路的“懿园”，虽也属于高级住宅，毕竟还是普通弄堂房子，里面并无戏台呀。这固然令人纳闷，最破天荒的是刻印老师陈巨来由于要同去观看，一改因烟瘾非傍晚不起的习惯，早早起身来舍间搭乘便车。在同车赴懿园的路上，才由谈话中得知，“地毯戏”即私家正式扮演之谓也，又知顾志成伯伯本名顾传价，原是鼎鼎大名的招牌演员，戛然改名改行，所以此刻有机会非看不可。

到后方知，原来就是顾家楼下那间客厅，把桌几等摆设全部挪开，仅在中间留出一块舞台大小的空间，四周摆列着各式凳椅供观众坐。音响场面十分简单，仅张传芳一人擂笛，另一司鼓，又一司锣，好像都是仙霓社旧人，但我叫不出他们的名字。在讲定的演出时间以前，要看戏的人陆续都来了，不多时四周即已坐满，好像也有拥立门外和窗外的。四周观众，我大多不认识，据陈巨来师言，在座有不少名人，他随口讲了几个，可惜现已记不全了，只记得有郭沫若和巴金。这天仅一出戏《长生殿·小宴惊变》。印象极深的是，唐明皇杨贵妃一出场，四围的嚶嚶嗡嗡叽叽喳喳刺那顿消，俱被戏场上唐明皇和杨贵妃一生一旦的双人表演所吸引。

叨在幼曾熟读白居易《长恨歌》，故对敷衍其故事的《长生殿》大致熟悉，虽然耳中已常闻《小宴》的旦角唱腔，但对生角唱腔还是陌生的。顾伯伯的确不凡，他一出场就一望而知是帝王气度，而且毋庸置疑是个风流天子，让人感到活脱脱一个唐明皇。其唱与白皆异常清楚，其时我对那些曲词尚不熟悉，但他一开口“天淡云闲列长空数行新雁”，字字清晰而悦耳，其下大部分唱词约莫半数可以听出或猜出。这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的做工，他的身上和脸上不停地有活动，却非毫无道理的轻举妄动，身段和表情都是配合剧情、诠释

副词。甚至连杨贵妃载歌载舞的唱段，也由唐明皇的无声动作一起烘托出来了。

在杨贵妃随着唐明皇一声“回宫休息去吧”而退场之后，场上只剩唐明皇一人连歌带舞的“惊变”，那真是精细雅致到了极点。此戏当然旨在刻画唐明皇闻报安禄山造反的反应，但顾伯伯在表达惊慌急怒之时，也处处不忘这是个帝王在慌怒，而不是输光的赌徒和破产的商贾。除了演员对人物身份的准确拿捏以外，他还施展了出神入化的演技。这是地毯戏，当然四面都是观众，无所谓背对或者面对之别，但从他无论是转过身来或转过身去，他的背部都有表情，可以看出他连背部都在演戏。

背部也在演戏这一点，并非我观察出来的，区区黄口小儿初次看戏不可能如此入微。是由于开唱之后，除笛声、锣鼓与唱白外，全场一片寂静，人人几乎屏息一声不出地聆观，直到曲终主人退场卸妆、众客自行散去（即所谓来不迎去不送），大家纷纷发抒观感，赞不绝口之中，交相提到背部演戏这一点，我始醒悟于此，回想果然不错。距今七十年矣，这出地毯戏在我脑中栩栩犹存，而且从此迷上昆剧，迷到现在可以为了看昆剧演出而飞越太平洋。在此七十年中，《小宴惊变》一直是昆曲的热门戏，看过不少内行和票友的男女老少各式人等所演此剧，留下印象皆不如此次地毯戏之深。

我算是明白陈巨来师何以甘愿为此而牺牲睡眠，看戏人也皆云不虚此行，同时也听到好些人慨叹：“这样好一个演员为什么一定要脱离伶界而改行？”其后，又陆续知道顾伯伯并不是因混不下去而改行，恰恰相反，他退出舞台时正是大红大紫的尖子头牌。也许只能用人各有志来解释吧。又过了约莫两三年，在解放前夕，顾伯伯突然造访寒舍，动员家父母亲与他家一起去台湾，家父母亲当然反劝他“国民党腐败至此，何必再去陪葬”，双方谁也劝服不了谁，就此不欢而散。但谈不上绝交，顾伯伯的女儿儿长期寄居苏州，此时苏州被团团包围，顾伯伯曾转悠一整天不得其门而入，此女遂未被带往台湾，后来在清华毕业，成才成家，家母一直视为干女儿。

光阴荏苒数十载，迎来了改革开放，我得以赴美，当然留心顾伯伯的消息，却听说他在台湾并不如意，55岁就早早辞世。对这样的伤心事，见了张元和大姨当然只字不敢提。直到最后，大姨及四姨父皆告病危，两位在东部的一同一城市，我自当飞往探视。先入住大姨之婿家。去后知四姨父已归道山，大姨则由医院转至“好自庇斯”（hospice），现正由其女及婿轮流二十四小时值班，我立即赶去“好自庇斯”参加轮值。第一次见识所谓“好自庇斯”这一待死之所，其实毫无死亡的恐怖气氛，窗明几净，倒是休闲纳福之地。

与大姨同室诸人各有帘子遮住，各皆独自清修无为。唯大姨一人帘子

高卷，已届九十八高龄的她犹倚枕躺坐，话是不大讲得动了，但神志异常清楚，我一到，她即自枕旁抽出一本新出版的英文《合肥四姐妹》：“这是耶鲁一位教授的新书，你看吧。”我即掀开读之，一连读了几天。大姨此时不仅讲不动话，也吃不下食，每次送餐来，她必彬彬有礼谢过，然后装模作样自己举动刀叉，我一抬头她立即喝令：“你看你的，我自吃。”我遵命低头续读，但眼角能感觉其手在四下挥舞，片刻后她吩咐：“好了，让他们来收去吧。”我才看清其食物皆堆积在盘之四围，似嚼过而未嚼透，草草了事也。

几天后，书读完了，我不擅假装看书，只好没话找话。因《合肥四姐妹》书中也提到四位连襟，第一位就是顾伯伯，而前此不久，大姨曾将其新编之《顾志成影像集编》邮寄

在下，故此时正好申谢，由此谈及大家都惋惜其改行，也提到她家的地毯戏。大姨正色而平静地言道：“顾伯伯一生只是迷昆曲，昆曲就是他的性命。那次地毯戏是我提议的，我对他说，你那么想演戏就在我们地毯上过一次瘾吧。”说至此，略略停顿一下，看得出她是在强抑感情，正在我急思如何岔开话题时，她已续道：“是的，不少人惋惜他改行，惋惜我们到台湾，其实在台湾那些年他经商没有攒钱，更没有从过政，他一辈子只对昆曲有兴趣。”这时我心想：你们演地毯戏的房子可是价值不菲呀。我似乎并未说出口来，大姨已接言：“懿园的房子还是我们结婚时买的，他除了戏曲艺术外，一心想成贤作圣、仁呀义呀，如何能做官发财？”喔，明白了，那房是大姨的嫁衣。

以上不妨视为大姨对我的临终遗言。当晚其子从台湾赶到，所以次日由其子去“好自庇斯”值班，那天也恰为耶鲁召开四姨父追悼会之期，故我随大姨之女及婿同住。眼见充和四姨一把搂住其另一位甥女啜泣：“我们四姐妹近几年好惨呀，二姐、三姐相继没有了，现在我的汉思没了，大姐正在弥留之际。”听到此，我们几人眼泪不禁夺眶而出，因为就在我们赴会的途中接得电话，大姨已经咽气了，此时此刻，谁又忍心对四姨报告其大姐的死讯呢？

大姨的骨灰由其子携回台湾，与顾伯伯合葬而葬。知顾伯伯者，唯大姨也。顾伯伯自始至终是活在昆曲的象牙塔中，一味想着忠孝节义的故事，吾爱其艺，更敬其人。圣人有言“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”，吾于顾伯伯身上得之。

『东昌』记忆

陆晨虹

新中国成立之初，“一五”计划中上海举全市之力建设9个成片居住区，与之配套的曹杨、天山、鞍山等一批新村中学应运而生。这些学校生源多为工农子弟，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占有时地利人和，后来都发展为名校，培养出一批带有时代特征的工军和理工科栋梁。

1954年，规划30个教学班的东昌中学，就是伴随着第一批工人新村——浦东崂山新村的建设而创办。与之同年诞生的，还有校园西侧8层24米高的东昌消防瞭望塔，和学校东北面有一千多观众席、没有空调的东昌电影院，它们均以1952年设置的东昌区而得名。东昌区的设置反映了浦东沿黄浦江江区域城市化步伐加快，与之相呼应的是社会事业发展：一方面，既有的民国老学校得以扩容，如浦东最早的市立中学洋泾中学在1953年到1957年间征地约50亩，兴建教学楼、运动场和校园农场；另一方面，一批南市老城厢的医院、学校渡江迁建，如公利医院，如糖业中学（今文建中学），城市文化浸润浦东，这一布局维持到浦东开发初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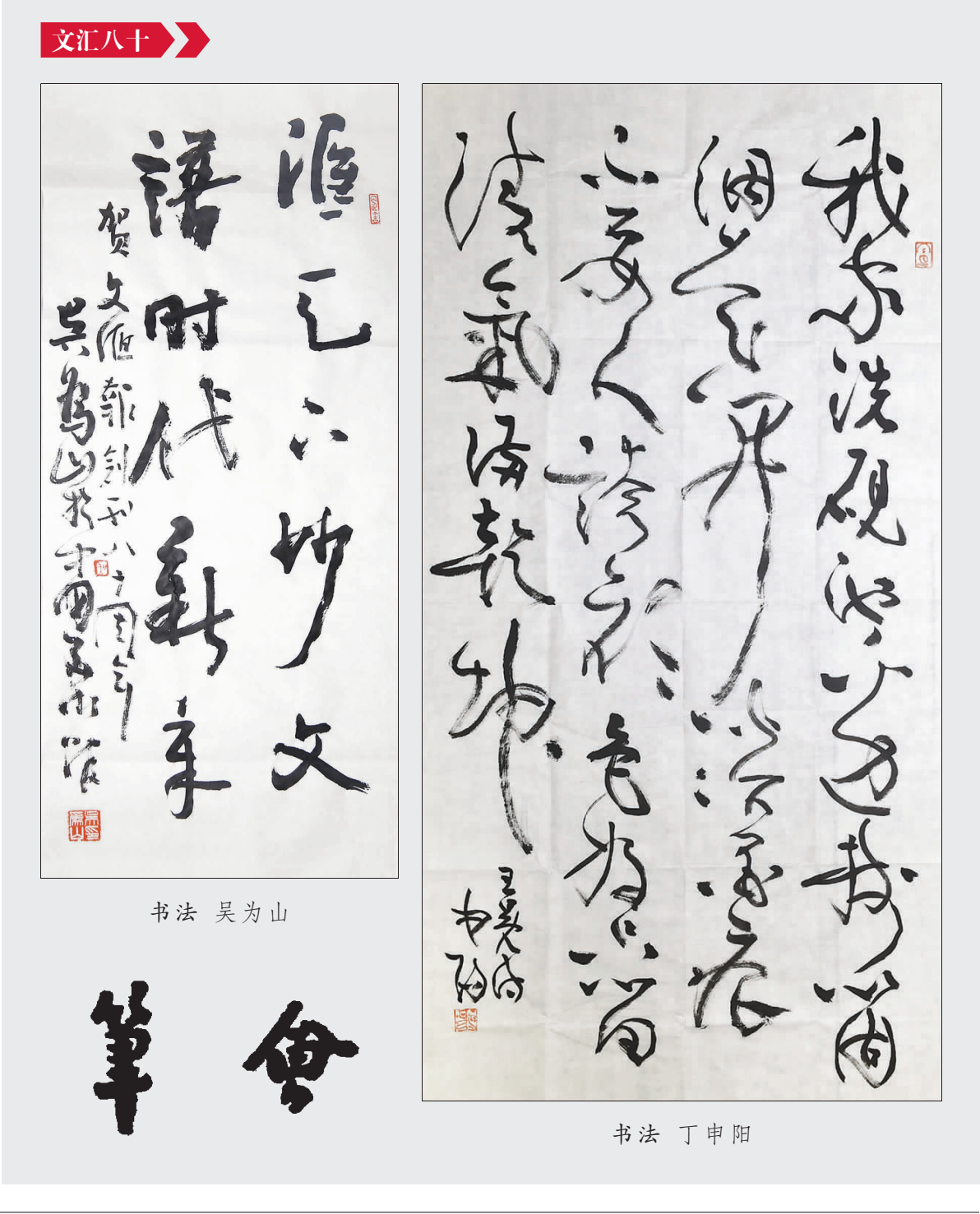
1987年我考入东昌中学初中部，沿着水杉茂密的栖霞路走进学校，迎面就是红瓦尖顶的三层教学楼，北门前粗大的立柱架起高大宽敞的屏门，穿过屏门走进门厅，可以看到大楼东西向呈I型，南北两面为教室，中间是深长的走廊。大楼两端突出部位是两层的辅楼，东首为办公室，西首朝北是听力、劳技等专用教室，朝南是宽敞明亮的图书馆阅览室。水磨石的走廊地面朴素淡雅，教室的红漆木门外挂着铸铁大锁。三年后的高中军训，晚上我们就在教室的木地板上铺席而睡，可以闻到透过红漆渗出的原木清香。奇怪的是，教学楼的厕所、楼梯都朝南。老教师说，当年协助设计的苏联专家觉得：“将来教室会装上暖气，而厕所和楼梯装暖气就太奢侈了，所以要放在阳光普照、冬暖夏凉的方向，何况这是学校的公共空间，该在最好的位置。”

中轴线上宽大的主楼梯，红漆的木扶手被抚摸得圆润光滑，楼梯转折处的半层平台，正临着铸铁雕花的整面南窗，阳光通透，可以望见中轴线尽头、照壁上熟悉的毛泽东手迹“好好学习”。东南方向有片水杉林，后面是黄土扑面的大操场。一次我在此闲看操场上班主任潘辛弟老师教女生打腰鼓，路过的老师由衷赞叹：“潘老师的腰鼓打得真好！”节奏变换的鼓声和灵动的舞步，不久就成为衬托学校各项集体活动的“绿叶”。

教学楼北侧有两棵枫杨树，东西相望，枝繁叶茂，需要两人才能合抱。树下的花园是我们的“百草园”。老楼东侧昔有“东园”，老照片上可见池塘亭树，可惜后被毁去，建军体校游泳池。我们读书的六年间，栖霞路两次拓宽，夏日幽静的水杉林砍掉了，春天落蕊的梧桐树换掉了。我们毕业后的房产开发时代，军体校游泳池又变成“房地大厦”。1994年学校扩招预备班，教室不够，刚成立的区社会发展局在教学楼顶按原风貌加层，前苏联气质的教学楼基础牢固，加层后更显巍峨。

2014年金秋，母校60周年校庆之际，与学校同时诞生的东昌消防瞭望塔已经消失，东昌电影院正在以告别展览宣告谢幕。但更让人意外的消息是，老师告诉我：教学楼老了，裂缝，渗水，学校筹划在“十三五”规划中拆掉老楼，建造更现代化的高楼——这曾是我们读书时在一篇作文中写过的理想，但是一旦真的听到这消息，却让我心生惆怅和不舍。

油然想起2014年的一个夏夜，我在多伦多旅行时，曾召集定居加拿大的几位同窗重聚，往事的碎片重新合成栩栩如生的场景：大楼里开办过浦东最知名的夜校“侨友进修学院”，兼任院长的区侨联副主席张建老师代过我们班主任，秋天到川沙学农，他能在细微处发现教育资源，引我们沿着钦公塘参观乡村敬老院、寻访张闻天故居、追溯大洪墩历史传说；倪天增副市长冬夜带着电视台记者敲开校门，视察传达室“夜间应急电话”。当年的假日里，我常骑车钻进东昌路的小巷，到同学家院落里打康乐球，此夜他指着浦东乡土教材地图上的东昌路老照片告诉我：“那是我小时候住的房子——青石铺地，砖墙厚墙，梁椽精美，可惜……”我相信，无论明天如何，延续六十余载琅琅书声的苏式老教学楼，在我们几代东昌学子的心中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。



二十四节气里，清明过后就是谷雨。公历4月20日左右，农历三月，时值春末，天气趋暖，雨水增多，有利于各类作物的生长。雨生百谷，是谓谷雨。

宋欧阳修《洛阳牡丹记》有云，“洛花，以谷雨为开候”。谷雨前后，为洛阳的牡丹花季，繁花盛开，芳华缤纷。“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”，唐刘禹锡笔下的《赏牡丹》，总让人想千里赴花会，一睹这喧动京城的天香国色。

当代英国知名的艺术家、学者马克·哈沃斯-布斯（Mark Haworth-Booth），也有深厚的牡丹情缘。他是1944年生人，1970年至2004年长期担任伦敦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（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）的馆长，在其弱冠之年，就出版了轰动西方艺术圈的《牡丹，一曰木芍药》（The Moutan or Tree Peony）一书。他于书中记述了艺术家眼中的牡丹，其中有一句写道，“中国艺术里，每个月份都有其代表花，牡丹就是三月的花”（In Chinese art each month is represented by a flower, and Moutan is specifically the flower for March.）

这三月，是农历三月，就是谷雨花的三月。暮春孟夏之交，牡丹花开之时。“有此倾城好颜色，天教晚发赛诸花”，刘禹锡的《思黯南墅赏牡丹》，似乎在催人动身前往洛阳，到南郭伊水头的归仁里，去欣赏那瓣瓣层叠的洛阳花。

关于牡丹的英文，马克·哈沃斯-布斯用了moutan，此乃音译自汉语的“牡丹”。这个moutan的拼法有着传统威妥玛拼音(Wade-Giles)的痕迹(以t代d)，且首音节mou疑是“牡”字的旧读(音“某”，《广韵》莫厚切)。

或者，moutan的英文拼法受到了

牡丹, moutan

曾泰元

法文的影响(ou = u, t = d)。这样的臆测并非空穴来风，150年前法国词典学家埃米尔·李特雷（Émile Littré）的《法语词典》（Dictionnair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, 1863 - 72）就有迹可寻，定义里的植物分类与现行者有异：

牡丹(moutan)，木本芍药，原产中国，芍药属牡丹种，俗称木芍药，毛茛科(pivoine ligneuse originaire de la Chine, poeonia moutan, Sims, dite vulgairement pivoine en arbre, renonculacées.)。

马克·哈沃斯-布斯在书名使用moutan之时，似乎担心英语世界不够熟悉，便以tree peony（木芍药）训释，补充说明。在他的眼里，牡丹的英文以音译的moutan居首为主，以意译的tree peony居次为辅，这也是《牛津英语词典》（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，简称OED）的作法。

1933年第一版的OED就以正常规格的主条目(main entry)收录了moutan，1989年的第二版加以增补，持续编纂中的第三版于2003年将词目全面修订。目前这个OED的moutan提供了充分而完整的信息，发

音、词频、词形、词源、定义、书证无一不备。相形之下，OED的tree peony只是个列在主条目tree（树）底下的副条目(subentry)，除了书证之外其余或缺，仅以简短的“即牡丹”(= moutan)一笔带过。moutan为主、tree peony为次的态势，在此一览无遗，不言自明。

OED在moutan的定义最后指出，牡丹“亦称牡丹芍药”(Also moutan peony)。是故，牡丹的英文名OED给出了三个，按主次先后，依序为moutan、tree peony、moutan peony。

不过，翻开市面上的汉英词典，牡丹的英译鲜少例外，几乎全是peony（芍药属），这并不理想，因为芍药属是一类，包含了芍药和牡丹，并不专指牡丹。我手机里有两个常用的词典App，一个是《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》，一个是《新世纪英汉双英大词典》，应该是“唯二”的例外。我键入“牡丹”搜索，两个词典App都返回了moutan这个英译。原因很清楚，这两个词典App的英汉部分都是英语词典的双解版，原版词典就收录了moutan，进行双解加工时出版社将之译为“牡丹”，先进的逆向检索利用数据加标(tagging)，让我们能够通过汉语译文轻松反查英文原文。

牡丹当今的拉丁文学名是Paeonia suffruticosa（字面“灌木状芍药属”），

这是分类学上标准的二名法(binomial nomenclature)。前面的Paeonia为“属名”，指的是一个类别，意为“芍药属”，这个Paeonia是英文peony的来源，最早源头出自希腊神话“众神的医生”之名。二名法后面的suffruticosa是“种名”，是个修饰前面属名的形容词，意为“灌木状的”。

生物若无常见的英文俗名，习惯以拉丁文学名作英文名。二名法的学名偏长，挪作英文名时常加以简化，只取第一个词以属名行之。牡丹则有英文的俗名，即上文曾提到的，音译的moutan（牡丹），意译的tree peony（木芍药），以及意义结合的moutan peony（牡丹芍药）。

英国的园艺举世闻名，最权威的当属1804年成立于伦敦的皇家园艺学会(Royal Horticultural Society，简称RHS)。RHS的历史逾200年，是世界最大的非营利性园艺组织。RHS出版了为数众多的书籍杂志，其中包括英文园艺的辞海——《皇家园艺学会园艺植物百科全书》（The Royal Horticultural Society A-Z Encyclopedia of Garden Plants）。此书在介绍牡丹时，拉丁文学名Paeonia suffruticosa之后就以括号加注了英文的俗名moutan，随后在形态描述中，又以tree peony强调牡丹的木本，有别于

芍药(herbaceous peony，字面“草本芍药”)的草本。

在RHS的另一本《皇家园艺学会园丁植物花卉百科》（The Royal Horticultural Society Gardeners' Encyclopedia of Plants and Flowers）里，牡丹的拉丁文学名后也是加注英文俗名moutan，描述形态时以tree peony突出其木本特征。不一样的，这本园丁百科有个《植物词典》（The Plant Dictionary）的附录，牡丹的英文只收moutan，未收tree peony。《汉语大词典》是这样解牡丹的：“著名的观赏植物。古无牡丹之名，统称芍药，后以木芍药称牡丹。”由统称的芍药(peony)，进而析出木芍药(tree peony)为牡丹，后以牡丹(moutan)之名通行天下，汉英两种语言在牡丹名称的发展上，展现出了诸多相仿之处。

宋周敦颐在千年前曾谓，“世人甚爱牡丹”。他口中“牡丹之爱，宜乎众矣”的牡丹，在经盛而衰，由衰复盛的起伏之后，如今又重获世人的喜爱。“花开花落二十日，一城之人皆若狂”（白居易的《牡丹芳》）。何妨谷雨时节奔赴洛阳，探访明天的牡丹呢？

